

穆旦——民族苦难的亲历者与表现者

□吕周聚

九叶诗人穆旦既是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穆旦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抗战时期和“文革”之后，而这两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时期。民族的苦难成为穆旦诗歌的抒写对象，穆旦成为民族苦难的亲历者与表现者。

穆旦原名查良铮，1934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写作，并开始用“穆旦”作为笔名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作品，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清华大学南迁，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穆旦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穆旦读书期间，正是中华民族经历战争磨难与痛苦的时期，年轻的穆旦饱经战争的痛苦与国家的苦难，用流血的心灵体验东北沦丧的战争创伤，写于1935年的《哀国难》真切地表达出穆旦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样的青天一样的太阳，/一样的白山黑水铺陈一片大麦场；/可是飞鸟飞过来也得惊呼：/呀！这哪里还是旧时的景象？/我洒着一腔热泪对鸟默然——我们同忍受这傲红的国旗在空中飘荡！”面对着东三省沦陷日寇之手的残酷现实，穆旦极为慨叹，“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坟墓里的人也许要急起高呼：/‘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揩残？/你良善的子孙们哟，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可惜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年仅17岁的穆旦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锥心之痛，从此，抒写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苦难、歌颂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就成为其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穆旦的诗歌不是仅仅抒写民族的苦难，而是抒发出中华民族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怒吼，他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只受伤的猛兽，从紫色的血泊中，抖身，站立，跃起，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野兽》他在南迁的路上看到了战火中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与死亡，但他并不悲观绝望，而是用诗的形式传达出对抗战胜利的希望，从内心发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呐喊（《赞美》）。

在4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抗战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如田间的《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满腔热情激励中国儿女奔赴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与这些作品相比，穆旦的诗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与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密切相关。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此时皆在西南联大任教，他们经常在学校里举行关于诗歌的讲座，自然会对在校爱好诗歌的学生们产生影响；二是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英国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讲师，也是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给穆旦等人开设《当代英语》的课程，艾略特、奥登、叶芝等现代诗人是课堂上主要的讲解对象。艾略特推崇的

“非个人化”对他们影响极大，他们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统一，将自我与大我、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因此，穆旦的诗歌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空洞的抒情呐喊，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情感的真实而深沉的生命体验。

穆旦于1940年8月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从事教学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有了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然而，他并非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而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1942年2月，穆旦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先在司令部任随军翻译，后随207师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在缅甸，穆旦经历了极为惨烈、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后历尽千难万险撤退至印度。关于这段战场经历，穆旦个人很少提及，但我们可以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中窥见穆旦的这一经历：“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穆旦）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诗人的这一特殊经历在其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其难以摆脱的噩梦。到1945年9月，他写下了《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士兵》。这是一部篇幅短小的诗剧，有“森林”、“人”和“葬歌”三个不同的角色，“森林”是死神，而“人”则是“森林”猎捕的对象，“森林”有其神秘、美丽的外表，而其一句“欢迎你来，把肉脱尽”则暴露了其吃“人”的真相，身处森林中的“人”，充满了极度的恐怖与紧张，“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像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诗人以诗的语言描述了胡康河谷的阴森可怕，“森林”死神轻轻地跟随着“我”，时刻准备将“我”吞噬掉；它充满温柔，温柔中充满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憩静，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这是战争、死亡留给诗人的极端恐惧，将此段“人”的独白与王佐良的文章加以对照阅读，则会发现穆旦所经历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双重创伤。在抗战结束后写下此诗，并非仅是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战斗的回忆，而是对战争、死亡的冷静思考。“葬歌”表现出作者对过去与将来、历史与现实、生

穆旦是民族苦难的亲历者，其人生充满了丰富的痛苦，民族的苦难成为他诗歌创作丰富而又苦涩的养料，他以诗歌的形式将这些丰富的痛苦呈现出来，成为民族的史诗。他不是仅仅抒写民族的苦难，而是从理性的高度来反思民族的苦难，对民族的未来充满期望。正因如此，他的诗歌如同一棵扎根于石缝、饱受风吹雨打的黄山松，遒劲挺拔，成为中国现代诗坛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这是一棵智慧之树，也将是一棵常青之树。

查《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录》，可知文学馆藏有九叶派著作版本有以下几种：

《探险队》，诗集。穆旦著。1945年1月文聚社初版。昆明崇文印书馆印行。昆明金马书店总经售。林元、马尔俄编辑《文聚丛书》之一种。内收《野兽》《我看》《园》《CHORUS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劝友人》《从空虚到充实》《童年》《祭》《蛇的诱惑》等25篇。

《穆旦诗集（1939—1945）》，1947年5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代售。内收《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不幸的人们》《我》《智慧的来临》《还原作用》《五月》《潮汐》《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等58篇，另附王佐良评论1篇。

《旗》，诗集。穆旦著。1948年2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九集之一种。内收《赞美》《控诉》《诗八首》《出发》《诗》《裂纹》《线上》《被围者》《退伍》《给战士》等25篇。

《珠贝集》，诗集。王辛笛、王辛谷合著。1936年6月初版。余不详。内收王辛笛《珠贝集（其一）》15篇、王辛谷《珠贝集（其二）》10篇，共25篇。卷首有南星《题赠》一篇。

《手掌集》，诗集。王辛笛著。1948年1月初版，印1050册。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印行。内收《珠贝篇》13篇、《异域篇》22篇、《手掌篇》11篇，共46篇。

《交响集》，诗集。陈敬容著。1948年5月初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森林诗丛》之一种。内收第一辑17篇、第二辑16篇、第三辑24篇，共57篇。

《星雨集》，小说散文集。陈敬容著。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一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八集之一种。收第一辑13篇、第二辑24篇，共37篇。

《盈盈集》，诗集。陈敬容著。1948年11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十集之一种。内收第一辑《哲人与猫》11篇、第二辑《横过夜》34篇、第三辑《向明天瞭望》26篇，共71篇。

《诗四十首》，诗集。杜运燮著。1946年10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八集之一种。内收《草鞋兵》《命令》《树》《号兵》《狙击兵》《游击队歌》《露营》《林中鬼夜哭》《风向袋（一）》《风向袋（二）》等40篇。

《噩梦录》，诗集。杭约赫著。1947年10月初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印行。臧克家主编《创造诗丛》之一种。内收上、下辑各6篇，共12篇。

《复活的土地》，长诗。杭约赫著。1949年3月初版。上海森林出版社印行。作品除《序诗》外有《舵手》《饕餮的海》《醒来的時候》共3章。

《火城》，诗集。杭约赫著。1948年5月初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森林诗丛》之一种。内收《启示》《岁暮的祝福》《寓言诗两章》《知识份子》《规律》《无题》《严肃的游戏》《感谢》《最后的演出》《致伪善者》等14篇。

《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郑敏著。1949年4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十集之一种。内收第一辑11篇、第二辑41篇、第三辑10篇，共62篇。

《诗第一册》，诗集。唐祈著。1948年5月初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森林诗丛》之一种。内收第一辑8篇、第二辑15篇、第三辑15篇，共38篇。

《骚动的城》，诗集。唐湜著。1947年10月初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臧克家主编《创造诗丛》之一种。内收《沉睡者》《偷穗头的姑娘》《给夜间睡眠的小鱼儿》《夜歌》《晨歌》《海上》《沉默的草原》《水磨坊的时日》《骚动的城》共9篇。

《英雄的草原》，长诗。唐湜著。1948年5月初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森林诗丛》之一种。除卷首《献诗》、卷末《合唱》外，有《草原的梦》《波浪·波浪》《宇宙的孩子》共3部。

——



中的“一叶”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非常状态的叙事诗创作是唐湜独异于九叶诗派的一个侧面。1944年，24岁的他以蓬勃的激情和淋漓的才气开始创作叙事诗《森林的太阳与月亮》的第一部《草原的梦》，一年后续写了第二、三部，并改题为《英雄的草原》，1948年作为《森林诗丛》的一种由森林出版社出版。这首长达6000余行的长诗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整个中国比较贫乏的叙事诗传统中都显得格外夺目。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他被错划为“右派”。为了不使精神崩溃，他理在故纸堆里写了15万字的《古歌舞剧（九歌）初探》。之后，便开始了南方风土故事诗《划手周鹿的爱与死》的写作，诗作未完成就被流放到东北的兴凯湖农场劳教，“去经历严峻的沉默的三年”，至1961年7月解除劳教回乡。1970年春，他在温州飞霞楼写毕该诗，改题为《划手周鹿之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专节介绍了《划手周鹿之歌》，称该诗是“汲取民间营养的文人创作”的代表）。也是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由近百首变体的十四行诗组成的历史叙事诗《海陵王》，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中挖掘远逝的英雄主义悲歌，其中的无奈和慨叹溢于言表。1998年，他在垂暮之年写作了《东瓯王之歌》，温州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民族史诗从此诞生。

“慧眼识珠”和“宝刀不老”的评论写作使唐湜在九叶诗派中显得无可替代。1940年代，当九叶诗派以“诗的新生代”的面目在诗坛崭露头角时，他即以“慧眼”识别其中的卓越者并予以高度评价。1948年8月，《穆旦论》发表于《中国新诗》第三、四集，该文高度肯定了穆旦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今天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其真知灼见的光芒和力度。1980年代，当九叶诗派“历劫归来”之时，他审时度势，郑重地向世人宣告“九叶在闪光”，并对其中的先逝者、遁隐者、回归者和前行者作了恰如其分的论述。除了对九叶诗派格外关注外，他还不断断地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添砖加瓦，一方面及时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自觉关注整个新诗发展的态势，2000年7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叶诗谈》为此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03年，他推出《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和戏曲论文集《民族戏曲散论》等著作。

先生为人极其天真，不谙世故；在文学写作上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飞扬的文采，但不善言辞，对一些在他看来的重要事件，会不断重复，而且容易激动；臧否人物极其率真，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不管是名人还是权贵，也不管是朋友还是仇敌；对文字工作极其认真，自己写作时强调“优美”风格，出书坚持亲自校样，给我他编撰的年谱要亲自审订，我给他写的专论要认真审读；对朋友极其真诚，不管是对像牛汉、屠岸这样的当年至交，还是对像我这样的年轻朋友，从来都是推心置腹，口无遮拦。

先生走了，在与病魔苦苦挣扎之后，但我无法忘怀先生经常流露的两种神情：一种举目凝望，一种低头沉思。在凝望和沉思的神情里，先生最初的诗句依然鲜活地跳跃着：

驾一叶纯白的轻帆/到蓝色的海上去//海是一个深湛的谜呵/望不见边际与天涯/望不见绿色的土地/望不见花香鸟语/莺飞草长//海是一个深湛的谜呵/海有恋人似的狂热/海上的风浪/会给你那白帆/抹上海的蓝色/海的气息/海洋深沉的感情呢（《海上》）

“一叶纯白的轻帆”在“蓝色的海上”航行了60多年，终于安息了！

文学馆藏九叶派文学著作版本辑录

□ 郑敏

2005年1月28日下午，冬雨凄迷，诗人唐湜在他的故乡温州辞世，结束了他念兹在兹的“幻美之旅”。

1920年生于浙江温州的唐湜，从小酷爱读书，读高中时就在校刊发表长诗《普式庚颂》。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救亡运动，22岁时在谢冰莹主编的《黄河》上发表了《海之恋》，正式开启了长达60余年的文学之旅。1943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首先醉心于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后转向里尔克、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1946年，他与李健吾、胡风、臧克家等相识，次年参加了《诗创造》的编务工作，一年后又和辛笛、唐祈、陈敬容、杭约赫一起创办《中国新诗》月刊，与北方诗人穆旦、袁可嘉、杜运燮、郑敏等南北联手，为现代主义的诗歌鼓与呼，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流派——九叶诗派的重要“一叶”。在此期间，他写下大量诗歌，结集有《骚动的城》《飞扬的歌》和长诗《英雄的草原》；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见解独到、文采飞扬的评论文章，其中对冯至、穆旦、汪曾祺所作的评论至今仍不断为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所引证。钱锺书先生盛赞这些评论“能继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刘西渭即李健吾，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咀华集》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评论集），而有‘青出于蓝’之概”。

新中国成立后，唐湜参加中国剧协，任《戏剧报》编辑，并担任北京多个刊物的编委和特邀编辑，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研究文章，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三个名剧、泰戈尔的四部诗集，写成《莎士比亚在中国》《萧长华谈京剧表演艺术》等专著。1958年，他因被错划“右派”而导致系列专著无法付梓。随后，他与中国文艺界的诸多“右派”一起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1961年，唐湜回到故乡温州，在永嘉昆剧团做了两年临时编剧，写下了《白兔记》《白鹿城》《百花公主》等多个剧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历尽劫难，长时间在温州房管局管辖的一个修建队下放劳动，直至“文革”结束，才在温州市文化局下属的艺术研究所供职。

唐湜一生坎坷，但对艺术的执著和忠诚矢志不改。20多年的艰辛磨难并未让他放下手中的

魂兮，归来

——纪念九叶诗人唐湜先生辞世10周年

□孙良好

诗笔。这期间，他写下了20多首叙事长诗、2000多首十四行诗。他的挚友、著名诗人屠岸称其为“诗坛圣火的点燃者”。作为当代中国诗坛最富产的十四行诗人，他被誉为“当今十四行诗人之冠冕”。1978年以来，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海陵王》《幻美之旅》《滔漫》《遐思·诗之美》《霞梦梦笛》《春江花月夜》《蓝色的十四行》《唐湜诗卷》（上下卷），散文集《月下乐章》《翠羽集》，评论集《新意度集》《一叶诗谈》《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和戏曲论文集《民族戏曲散论》等著作。

唐湜毕生精力所从事的文学创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当前中国高校最具影响力的两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他均有相当篇幅的介绍；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曾两次为他开辟研究专辑；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展示了包括唐湜先生在内的“九叶”诗派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他还获得过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抗战时期作家纪念章，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金质荣誉奖章，浙江省当代作家50杰奖（1949—1999年）、浙江鲁迅文学艺术奖（2002年）、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1985—1988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温州市第五届文学艺术创作特别奖（1996—1999年）、温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艺海长青”奖。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称唐湜是“一位唯美的现代诗人”，“他有非凡的想象力和不竭的诗思”，“他是当日中国——至少是战事日益逼近的南中国诗歌运动的最及时、最有力、也最权威的阐释者”。

唐湜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在长诗《幻美之旅》的后记中所言：“是一个精神巡礼的行程，一次生命的航行的悲剧，那是一个歌人的对美的幻想，对生命的诗的不断的追求，经历过一连串不幸的苦

难而到达最后的幸福的奋飞。”

二

从1946年春在上海臧克家认识了后来同为九叶诗人的陈敬容和杭约赫，到2003年3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唐湜与九叶诗派结下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贯穿始终的抒情诗创作是唐湜融入九叶诗派的有力明证。他幼时爱读中国古典小说、爱听中国古典戏曲，新文学作家中最爱冰心、何其芳，这些文学营养滋养了其最初的诗笔。1943年，在龙泉山中的战时浙江大学，他受莎士比亚、雪莱、济慈们的影响，进入浪漫主义的幻想王国。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后，他开始接触欧美的现代诗作与诗论，由雪莱、济慈跃向了里尔克、艾略特。是年假期，由于粮荒，温州爆发了反饥饿的罢市斗争，他为此作组诗《荒凉的、骚动的城》，包括《荒凉的城》与《骚动的城》两首，第一次尝试着用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来写诗。1947年7月，他参与臧克家、曹辛之（杭约赫）、林宏们组织的星群出版公司，在该公司出版发行的《诗创造》月刊担任编辑工作，并以诗集《骚动的城》参加臧克家主编的《创造诗丛》。1948年6月，他和方敬、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以森林出版社名义创办《中国新诗》月刊，继续发表大量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抒情诗。1949年之后的30年，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在中国大陆受到排斥，他先是转行到戏剧领域“驰骋”，后来又以“多样的十四行”进行艰苦地“潜在写作”。由于现实的难以言说，此一时期的写作经常游离于现实之外，而在历史和民间寻找诗歌资源。1979年12月，